

改革开放40年社会建设回眸

杨敏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近代以来,工业化的历史洪流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涤荡传统、走向现代,这是一个解构旧的社会和构建新的社会的漫长过程,正是这一历史进程催生了社会学,而社会建设则是社会学对现代性巨变的学理回应。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实践助推中国社会建设研究全面推进并取得了本土特色社会学知识体系的积累。从新时代社会建设的新布局出发,中国社会学在社会建设研究领域形成了诸多富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如今,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学术范畴。

[关键词] 中国社会学; 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研究

[中图分类号] C 9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9)03-0052-11

[DOI] 10.16783/j.cnki.nwnus.2019.03.006

借助于本土社会方方面面的现实素材,中国社会的社会建设研究呈现了一条贯穿性的宏脉,呈现出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近现代的转型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紧扣时代脉搏,对中国社会40年的快速变迁和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了积极的学术思考和实践探索,社会建设由此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社会学与社会建设

在中国社会学中,社会建设并不是一个新概念。19世纪中叶,在中国社会跨入近现代的门槛之际,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建设一个新社会成为当时志士仁人的使命,社会建设因此具有了特定的历史特征。可以说,正是在构建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社会建设这一重要的学术和实践领域。

(一) 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建设”

作为对现代性的一种回应,社会建设折射出社会学对工业化现代化的独特研究视野。在此视野下,关于社会建设的探究获得了较强的历史方位感。同时,社会建设也因为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自然禀赋和人文品质而具有空间特征和现实内

容。还应当认识到,社会建设是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学术范畴,也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历史范畴。在中国社会迈入近现代之际,在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境之时,形成了社会建设这个与中国社会学相伴相随的重要研究领域。

在社会学视野中,社会建设是与现代性相伴而来的一个重大题域。这一过程使前现代的初始群体、自然社区、城邦、乡村不断瓦解,人们的集体记忆和行为也发生了动摇,根本性地颠覆了传统秩序的维系机制。随着各种狭小、松散、孤立的人类生存聚落逐渐被熔为一体,与以往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共同体形态开始出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呈现出了明显的区别。传统崩解的进程也是重建社会的过程,由此赋予了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从社会学的发展来看,有关社会建设的研究不仅构成了社会学基础理论的内容,而且也推动了社会学重要分支应用领域的形成与发展。

首先,从古典时期到当代西方社会学,有影响力的基础理论研究无不是与社会建设这一重大题域相联系的。由人类共同体的剧烈转型而引发的深沉的时代困惑促使理论探索向社会重建聚焦,形成了

[收稿日期] 2019-02-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任务项目“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的新全球化进程与新发展主义研究”(18JF242)

[作者简介] 杨敏(1955—),女,河北清河人,社会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从事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社会建设、社区建设等研究

古典时期社会学理论的一条主线，如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论、滕尼斯的共同体论等，对社会、秩序、分化、整合、变迁等进行了思考和分析。这一思想主线也贯穿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时期，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论、社会互动论、知识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后工业社会学等都对社会秩序的转变及维系进行了深入探究。当代西方社会学的结构化理论、个体化理论、交往沟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等，对西方社会出现的种种新趋势做了新的理论思考。而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则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弊端进行了激烈批判，其实质是对社会重建的消极回应。再如经典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其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论述了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物质资料生产，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了特定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则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了社会的变革以及人类社会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关系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历史的实践的过程性和规律性，显然反映了重建社会这一现代性议题，也是对社会重建的一种理论思考。

其次，社会学应用分支研究的发展也与现代性提出的社会建设重大题材难以分开。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早期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的深入分析，为阶级阶层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同时也开创了社会冲突、社会运动等研究。不仅如此，两大工业阶级的直接对立与冲突也导致了劳工运动、妇女运动、民权运动、政治运动的兴起，一批常设性和职业化的大型组织——政党、工会、妇女、青年协会等——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而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等诸多分支研究也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剧烈的社会分化激化了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也推动了社会权利、社会公正以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的研究。此外，现代市场化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市民阶层，市民社会成为了与国家市场相对独立的第三领域，“国家—社会”关系及“政府—市场—社会”关系也日渐显示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结构性意义，由此也为社会建设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视角。及至当代，西方社会普遍面临高昂的福利开支越来越难以

为继的现实，已有的“福利共识”出现了瓦解，西方社会再次面临新的冲突和动荡。此前，欧洲多元社会福利理论提出了普遍福利、混合经济和阶级合作等社会政策原则，社会质量运动围绕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等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新的探索，以“第三条道路”为代表的持中间立场的改革诉求，一再显示了社会重建议题在这一时期的重大变化。

（二）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社会建设研究

在中国社会学的开创时期，对社会建设的思考和研究已经起步，如严复、梁漱溟、孙本文等的社会建设思想，在早期中国社会学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1. 严复“善群进化”的社会建设思想。1903年，严复在《群学肄言》中，将“社会学”（sociology）译为“群学”，并指出：“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②严复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把社会学看做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独特而悠久的学术传统，即注重考察社会的治乱兴衰，以把握历史演进的缘由。正如程颐所言：“看史必观治乱之由，及圣贤修己处事之美。”^③在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中，一部中国历史也是治乱兴衰的社会史。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在翻译斯宾塞著作之初，试图透过进化论重新解释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轮回。然而，面对当时西方社会的许多弊端，他逐渐认识到了进化论的局限性，进化的自然之道并不能达到国家民族的昌盛，只有善群才能避免治乱轮回，因而是群学的根本。严复因此主张，群学应秉执“求治去乱”的追求，实现“正德”、“利用”、“厚生”的社会目标。^④严复对群学和治乱盛衰的阐述，表达了实现重建中国和治理社会的思路。一定意义上说，严复已经对后来我们所说的社会建设有所探察，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社会建设对于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意义。

2. 梁漱溟“重建乡村”的社会建设思想。立足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国情，梁漱溟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传统文化、社会组织等作了深入研究。在他看来，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文化重视人伦、情感，因情而有义，以此为义理原则，也是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基础。他主张，中国文化和文明是以农村为根基的，中国近代以来农村的

衰败，实质是中国文化的衰败。因此，克服乡村社会问题，进行乡村建设，必须从文化入手。^⑤梁漱溟坚持以农业和农村为基础，实行乡村自救的建设运动，通过复兴乡村社会，重建乡村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组织等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对更高层级的政府组织机构进行改造，逐渐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达到重建中国社会的目标。梁漱溟“重建乡村”的社会建设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但他试图不触动当时旧中国的基本制度，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来改变中国社会，也是有明显局限性的。

3. 孙本文体系化的社会建设思想。在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中，孙本文对社会建设作了较系统的阐释。孙本文的社会建设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社会学原理》、《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社会建设的基本知识》等文著中。他将社会建设界定概括为三种：认为社会建设就是社会上一切事业的建设；认为社会建设是与物质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心理建设、文化建设等相对之称；认为社会建设是关于人类共同生活方面的各种建设，例如风俗制度、共同信仰、公共卫生等的建设。孙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将“社会建设”定义为：依社会环境的需要与人民的愿望而从事的各种建设。社会建设的范围甚广，举凡关于人类共同生活及其安宁幸福等各种事业都属于。后来，他对社会建设的对象与范围、目的、标准、途径等作了阐释，并对社会建设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探讨，着重分析了法令、教育和宣导的重要作用。孙本文清楚地意识到，民众的广泛参与是实现社会建设的基础和保证，所以，必须启发民众、动员民众，使之热心地推进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就大有希望。

4. 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社会建设思想及实践。尽管很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使用社会建设这一概念，但一直坚持对社会建设的探索和实践，这一过程形成了一系列社会建设思想，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社会学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也是社会建设的历史。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对社会建设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代表性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李汉俊、毛泽东、陈翰笙、许德珩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探求变革中国社会和振兴中华民族的现实途径，对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展开了大量调查，对中国社会的实际

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一过程也推动了有关社会建设的思考和探索。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对社会建设思考和探索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毛泽东提出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要以中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⑥以对农村社会的认识作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反过来，通过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深入对农村社会的认识、找到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形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社会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历史进程看，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和扩展，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建设实践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进行的局部性社会建设实践为取得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的来说，在现代性变迁的历史视野中，社会建设呈现出动态性，其内涵和领域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时代特征。广义的社会建设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是指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的建设。狭义的社会建设则是指与国家、政府、市场领域不同的第三领域，即社会领域的建设。在当代，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社会建设作为“五位一体”的一个方面，是这一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建设经过了历史演变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学术范畴。

二、从社会主义发展初期到改革开放的社会建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社会建设也进入了新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是全国范围的社会建设的起步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建设从局部实践转向全面性的探索，对各个领域的具体制度、体制、政策等进行了探索、设计和实施。特别是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建设的发展。然而，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一时期的社会建设处于尝试性的探索阶段，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在当时的“以政治为本”倾向下，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重视发挥政治的功能，造成了社会建设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特征。特别是在计

划经济体制条件下, 社会资源高度集中, 缺乏合理的配置机制, 不仅扭曲了按劳分配原则, 而且导致了绝对平均主义倾向, 既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 也妨碍了社会公平。同时, 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社会资源集中配置, 主要依赖单一的行政机制, 极大地抑制了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 不可能形成合理的“国家—社会”关系, 以及“政府—市场—社会”合作关系。而且, 频繁的群众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 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也导致了社会建设的种种曲折。总体上看, 这一阶段为后来的社会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并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建设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总结了我国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 重新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 指出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推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通过发展经济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以这次会议为标志,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走上了历史性转折。在向市场化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 社会结构体系、社会规范体系、社会心理以及文化的重大转变, 使得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逐渐突显出来, 我国社会建设也揭开了新的一页。从1978—2002年, 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六大召开之前的这段时间,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社会问题, 是这一阶段社会建设的基本特点。这一阶段的社会建设扩展到了各个领域, 内容也日渐丰富, 涉及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 以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 应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出现的各种新挑战, 社会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总体上看, 自上世纪50年代初, 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学科调整, 由于社会学学科在高校教学建制中被取消, 造成了这一时期社会学对社会建设研究的“学科缺位”。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 社会学学科得到恢复重建, 在这一全新的时代背景下, 当代中国社会学大大推进和更新了社会建设领域的研究。

三、新时期实现全面小康的社会建设

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社会建设也受到了高度关注。对于社会学而言, 与前一阶段“学科缺位”的情况不

同, 社会建设作为社会学的传统内容得以重新启动, 这是社会学学者对社会建设的实践探索努力参与, 对社会建设的学术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时期。社会建设这一重大题材促进了中国社会学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更为深入的观察、分析和研究, 确立了文化自信、理论自觉的学科精神, 推动了对“中国理念”“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持续思考。社会建设研究领域形成的丰硕成果, 加快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

(一) 社会建设的新阶段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 标志着我国社会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目标, 并提出了“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更加殷实”的具体目标, 这一表述明确了新时期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报告多处涉及社区建设, 强调要发展社区服务, 方便群众生活; 完善城市居民自治, 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 高度重视社区党的建设, 以服务群众为重点, 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等。特别是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社会和谐的思想, 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时期社会建设的研究和实践。

2004年以来, 中共中央一系列重大会议都涉及到社会建设。如,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中, 指出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同时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在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内容中, 指出了要整合社会管理资源,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并强调要更新管理理念, 创新管理方式, 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 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其中,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体现了社会建设过程多元主体的合作原则、机制和方式, 意味着对“国家—社会”、“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政策语言表达。此外, 报告阐述了“四位一体”的社会建设思想。

2007年10月, 中共十七大召开。党的十七大报告单设一章, 阐述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社会建设, 完善社会管理,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报告在强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同时，提出了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标志着“五位一体”社会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此外，十七大修改后的新党章中明确写入了社会建设的内容。

（二）新阶段社会建设的基础性研究

首先是关于社会建设的内涵。在各个国家及我国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建设的重点有明显差别。中国未来30年的主题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是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系统工程，涉及改善民生、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治理、培育社会组织等。所谓社会建设，从正向说，就是要在社会领域或社会发展领域建立起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从逆向说，就是不断地研究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创造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以便更好地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增进团结，改善民生。十七大报告体现了社会建设以人为本，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也凸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和我们进行社会建设的本质属性。当前，加强社会建设的关键，就是要让财政的钱更多地花在老百姓的身上。^⑦

其次是社会建设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研究。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发展，“国家—社会”关系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问题。这一时期形成了“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些新视角。譬如，社会互构视角认为，社会与国家分别表征了人类生存共同体相互关联的两个侧面，社会型塑国家，国家也型塑社会，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体现了对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不同配置方式。又如，以历史文化语境视角对于“国家—社会”有明显不同的思考和回答。在西方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国家—社会”的紧张关系既是一种历史的常态也是一个现实的困境，应当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的社会转型变迁中，对“国家—社会”关系给予更为合理的解释。再如，城乡社区视角认为，城市基层社会始于国家型构街居制，实施街居制的最重大结果是改变了历史上政府与民间两类组织在“基层”长期并行的格局，依托街居制而形成的基层社会包括了精

细和复杂的思虑和设计，形成了国家统合机制与社会配合机制。其他还有市民社会视角、社会结构视角、人类学自下而上的视角等。^⑧

第三，社会建设与社会资源。社会建设与社会资源配置有着密切关系，为此必须推动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作用，以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贯穿在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既是“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的实质，也是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协作关系的实际落点，是社会建设、社区建设、社会治理等绕不开的核心问题。这一研究促进了中国本土社会学理论话语的发展。同时，社会资源的探索也推动了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研究。研究者认为，社会资本概念与理论的兴起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应发扬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意识，探索中国传统社会资本创造性转化的有效途径。中国是社会关系十分发达的社会，个人摄取社会资源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关系网络的质量。研究者对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引起的社会网络资本结构、功能及其运作机制的变化，社会网络资源与职业流动、目标收入、职业流向以及劳职配置的变化，以及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⑨

第四，社会建设与“中国理念”和“中国经验”。社会建设直接促进了社会学者对“中国理念”和“中国经验”的探索，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理论水平。一是“中国理念”和“中国经验”。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进程中，可以体悟到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融合一体、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我们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这一理念促成了“中国经验”的持续成长。二是“中国经验”的内涵。“中国经验”是指已经条理化 and 上升为理论的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方法或中国社会转型途径和方法的总结，“经验”不是仅仅指“成就”，它也包括“教训”，是具有独特性的新规则，它是开放、包容和不断变化发展的，它尊重其他的经验选择。三是“中国经验”的基本要点，包括渐进式改革的普遍规则，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步进行，社会稳定优先原则和稳步的民主化探索，长期坚持低生育率和减贫政策，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等。四是“中国经验”的研究视野，要将本土经验与现代性全球化联系在一起，运用社

社会学“二维视野”和“双侧分析”把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和分析，显示其全球性和世界性的价值意义。五是“中国经验”的研究方法。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结合引进的西方社会科学，发育出中国本土化的社会科学，揭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是一项紧迫任务。为此，要克服脱离中国实际情况、局限于个案经验、缺乏整体性思考等问题。^⑩

（三）和谐社会建设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个时代和实践的重大议题，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这一探索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和谐社会的社会学探索。一是和谐社会的内涵。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对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二是社会学研究与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学，中国的社会学也要在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发展和繁荣起来。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调整社会结构，协调利益关系，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都需要社会学。三是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合理调整社会结构，有针对性地构建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和谐，包括构建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就业结构、代际结构、人的发展和自然、价值观以及国际交往环境的和谐。四是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在于优化社会结构，关键在于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着力点在于制定和实施系统的社会政策。和谐社会是要把所有的社会资源整合起来、协调起来，形成合力，向着一个目标前进。五是防范社会风险，消除不和谐因素。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是要协调好社会的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化解新生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是叠加的，应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实施多元化风险管理策略增进社会安全。要探索新型社会风险对农民生活各种层面产生的影响，应确立新型风险意识、促成相应的风险应对机制的完善。以往安全研究侧重于强调整体性安全，其实个体安全才是更为基本的、本体性安全，是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人类安全的基础和归宿，应从“现实的困境”与“未来的威胁”两个角度，对个体生活中的不安全

因素及影响给予分析。^⑪

其次，社会公正研究。本世纪以来，社会学有关社会公正的研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是社会心态与社会公正。近几年来，人们关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已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应当对收入分配的政策、制度、法律等进行调整，从而调整人们关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二是作为价值的社会公正。平等与公平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平等强调的是某种“同”，公平强调的则是某种“异”，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遵循公平的正义概念而不能实际奉行平等的正义观念。三是社会分层与社会公正。社会分层方面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公平观，即“消除地位差异”公平观和“地位准入”公平观。改革开放以来“地位准入”公平观开始受到重视。社会政策则应重视公平，以防止出现过于严重的两极分化。四是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社会公正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社会公正作为内在的规定性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性质和趋向，公正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 and 根本动力，应倡导“作为公正的发展”新思想。五是社会公正与制度建设。社会公平有两个维度：制度安排与百姓认可。制度安排合理性的社会公平，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源分配和获得的差别是合理的；百姓共同认可的社会公平感，可以通过社会指标体系来加以衡量。保障社会公正的实现要加强转移支付、收入分配、税收调节、社会保障、社会互助等制度建设，以及诉求反应、民主参与、整合协调、评估调整等机制建设。中国应该建立以“底线公平”为原则的、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社会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公共卫生和大疾病医疗救助、公共基础教育等是基本的制度性内容。^⑫

第三，民生为重的社会建设。以民生为重、以民为本体现了我国社会思想中的一个悠久传统，《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句子。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速的同时，社会建设也面对着诸多问题，民生问题是许多社会问题的聚焦点。社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形成了“民生为重”的社会建设思想。一是民生和民生问题的内涵。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基本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的状况等。民生问题，就是老百姓遇到的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二是民生问题与社会矛盾。伴随人民群

众物质文化需求的提高,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方面,产生了一些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由此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三是民生问题的解决途径。要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体现到改善民生上,通过经济发展扩大经济总量,带动全体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财富拥有量的增加;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政策来解决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社会安全等问题。要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民生问题的新特点,改善民生要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解决历史遗留的民生问题上有新举措、新突破。四是解决民生问题与制度建设。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目标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这就不能回避社会矛盾。为了阻断与化解社会矛盾,需要设计一整套制度安排。构建事中的应急管理制度、事后的社会矛盾化解制度、事先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以及公平竞争制度与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务公开、社会监督制度和民主决策制度。^⑩

第四,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离不开社会治理,只有通过治理和良好的治理,才能实现社会建设。“治理”(governance)一词在中西方长期存在,初始涵义有统治、控制、操纵等意。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主要是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相联系的。社会学者的研究重塑了社会治理这一概念,使其具有了全新的本土理论和实践意涵。一是社会治理与社会转型。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体制外社会成员的日益增加,政府越来越面对多元化、个体化、个性化需要,社会建设也面临许多更为微观和日常的问题,这就促使公共服务向基层下移,以往由政府主导的、单一行政机制控制的管理过程,也不断转变为政府负责的、多主体参与的治理过程,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新格局推动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发展。二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急需解决研究社会治理的基本理论问题,要研究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根源及其化解途径等,把握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些关键问题,科学认识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建设的主体目标,改革完善政府的社会治理体制,发展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等。三是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改变以往偏重管控的思路,在战略上把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密切结合起来,用管理和服务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社

会治理,提供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因此必须重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切实加强社会组织自身的建设。四是社会治理的多元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包含了多元主体的参与,即以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等构成多元主体,发挥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形成一种合力来共同治理社会。五是农村社会治理。实现农村社会的有效管理,必须建立一种复合式的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包括推动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法律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准则,形成以权利保障与民生建设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机制,加强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危机应对机制建设。^⑪

第五,社区建设与社会建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期,我国社区服务开始起步并不断推广和深化。自新世纪初至今,我国社区建设的总体格局已经形成,社区建设越来越显示出对于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在社会学者的推进下,社区建设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是社区建设与社会转型。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采取了独特的单位制,实现了社会资源的大规模集中和有计划配置,国家宏观计划能够一直下沉到社会基层。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解体带来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也随之改变,社区建设逐渐成为了一个前沿领域。二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随着社会持续转变,原本由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承担的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等职能不断被剥离,移交给了社区居委会,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也向基层社会下沉,社区建设覆盖了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民生“五有”的内容。三是社区建设的体制机制。现行的社区建设体制是政府改革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结果,并未改变“政社不分”的传统社会体制缺陷。通过社区建设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切实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积极培育民间社会组织,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分工合作体制,使以往政府主导的、单一行政机制的管控,转变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过程。四是社区自治和社区参与。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要转变社区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倾向,促进居民与居委会的互动关系,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参与形式的多样化,使社区居民和居委会形成互惠合作的双向互动关系。五是社区福

利和社区服务。应当以社区居民实际需求作为福利供给的依据，以社区作为社会福利资源整合的平台和载体，建立以社区公共团体为依托、以政府支持为前提、以公益性和福利性服务为宗旨的社区公共服务模式，形成社会保障、商业市场、公共服务相匹配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六是农村社区。社会转型使传统农村社区不断从静态结构向动态结构变化，应当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推动乡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加强农村公共服务，重建农民的社区及社会信任和认同，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⑮

四、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建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下，社会建设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学以文化自信、理论自觉的学科精神，不断推动“中国理念”“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再思考、再实践、再探索、再创新、再凝练，成为新时代社会建设的突出特点。

（一）新时代社会建设的新布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改革创新，新发展理念和共享发展等重要思想，规划了新时代社会建设的方向和任务。

第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的社会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明确了社会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明确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社会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

第二，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建设的着重点。改善民生重在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必须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社会建设要以促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脱贫攻坚、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社会治理为根本目的。

第三，新发展理念和共享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并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了中国特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新时代的社会建设研究

这一时期，社会建设的学术和实践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有关社会建设研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⑯

1.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社会建设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更加注重健康、食品安全、环境安全，消费需求更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更重视生活的主观感受，都需要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和调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对社会政策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对新时代我国民生需求的新变化和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做全面深入的分析，立足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构建中国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也带来了社会治理的全局性变化，必须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化解影响社会秩序和活力的新的结构性矛盾。应当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制度设计，以保障美好生活预期。政府职能转变是公共服务模式变迁的制度基础。目前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供给还不能有效地匹配需求，政府不是要包办所有公共服务，政府在转变职能的同时，要认真探索如何创新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2. 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与社会建设的品质化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国加快了全面实现小康的步伐，民生方面基本实现了“劳有所得”，教育普及程度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度提高。目前，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把保基本和补短板结合起来，攻坚的民生问题和群

众反映比较强烈的民生问题，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要正视民生资源供需矛盾尖锐、民生事业发展体制机制不完善等事实，着力解决基本民生领域存在的主要短板现象及问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与基层社会的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不仅反映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也在微观层面的基层社会生活中，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日常化、品质化特点。因此，要把握微观层面日常生活中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3. 新发展理念的共享发展与社会建设

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丰富和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新时代发展思想的精髓，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如何发展的时代课题，阐明了发展依靠人民，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力量，成果由人民共享。共享发展理念包含了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等不同层次的意涵，强调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观念、权利和义务。共享发展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内含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条主线，指明了未来一定时期里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挑战及实际问题，蕴含了应对各种现实矛盾、化解经济社会风险的思路和途径，也为新时代社区建设以及社区文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促使我们用心体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尤其是把握人民对更高品质的文化需要和精神需要。

4. 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

党的十九大以来，社会学有关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及基层社区治理的研究，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主要研究有：一是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指的正是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相区别的社会子系统，社会治理更强调全体社会成员的参与和享有。要适应新常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构建与当代社会建设目标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制和模式。二是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社会治理和善治或良治的核心，在于发挥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优势，以避免和减少“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在党委领导之下，促进行政机

制、社会机制、市场机制、法治机制以及德治、法治和自治的结合，以互联网与大数据等核心技术推动治理技术手段的更新，实现社会治理的复合型体制机制。三是城市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变。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单位不再是公共产品的配置机构，社区具有了实现治理重心下沉的重要功能，“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也拓展了城市社会治理的功能。四是基层社会治理。我国的居委会/社区既是“社会基层”，也归属于基层政权管辖，由国家的组织社区机制、社区的配合机制、社区的自我维持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基本上规定了城市基层社会的运行方向、基本特征以及改革要解决的主要命题。五是基层社会协商。随着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以及社会治理过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等，都是重要的现实课题。六是基层社会治理手段创新。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理念构想、实践方略、技术手段是相依不离的三个方面。任何历史阶段上的治理所能达到的水准与效果，最终还取决于治理技术和手段。传统治理的技术形态长期制约着基层治理，当今互联网与大数据两大核心技术推动了国家治理的技术手段更新，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一个历史之问，将重新聚焦实践中的大量新问题。

5. 新全球化视野下的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

“一带一路”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化、全球化，也推动了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研究。一是全球事务与社会治理挑战。目前，各国自身的“社会整合能力”经受着考验，必须思考社会的再组织所依赖的一系列新制度安排，在主动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治理多元化、信息现代化的迅猛发展及其诸多挑战的同时，形成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新理念和新战略。二是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在实践中“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模式在世界各国依然大行其道，引发各种令人困惑的矛盾，发展模式的理论预设偏颇、主题选择片面、研究单元宏大等局限，导致模式研究潜藏着严重的危机。不能仅仅局限于探究模式运行的一般规律，还应通过对微观个体行动者、中观地域社会以及以国家为单元的发展模式层级体系的研究，以克服模式研究的局限。三是发展社会学理论。应关注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各种发展现象，集中探讨人类社会如何发展，尤其是落后国家

和地区如何追赶先进国家和地区、实现自我发展的问题,充分吸纳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等学科知识,探索和建立一整套能够系统反映具有转型社会特点的社会学理论与实践体系。四是新发展理念与发展社会学创新。当代中国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陆海双轴均衡的地缘政治理想状态,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具有由更为深入的交流汇通而达到的深度交融和互构共生的前

景,成为引领新全球化的内在基础。“一带一路”的新发展主义理念和行动机制将促成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一过程也拓宽了发展社会学的深远空间,发展社会学面对发展格局的巨变、发展趋势的转向、发展需要的变移、发展关系的调整、发展模式的新探索,也面对解决发展困境与全球治理、发展理论基础的创新的绝佳机遇。

[注 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 ② 严复:《原强》,参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页。
- ③ 程颐:《遗书》卷二十四,见《二程集》。
- ④ 参见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9页。
- ⑤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 ⑥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 ⑦ 李培林:《加强社会建设理论和经验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颜焯:《从三农主义到结构主义——陆学艺社会学思想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郑杭生:《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区建设——对社区建设的一种社会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6期;陆学艺:《加快社会建设:我国当前和今后的重大战略任务》,《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景天魁:《社会建设的构思和周密布局》,《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洪大用:《中国低碳社会建设初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 ⑧ 周晓虹:《社会学与中国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郑杭生、洪大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从文化的角度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李友梅:《城市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毛丹:《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型构——1949—1954年居委会档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5期。
- ⑨ 奂平清:《“关系社会学”研究反思》,《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周长城、陈云:《贫困:一种社会资本视野的解释》,《学海》2003年第2期;张文宏:《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资本的变迁》,《社会》2008年第3期;钟涨宝、黄甲寅、万江红:《社会资本理论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解释功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 ⑩ 李培林:《中国经验的基本内涵与要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11月17日;杨敏:《“国家 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创新公共服务和更好社会治理》,《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郑杭生、黄家亮:《“中国故事”期待学术话语支撑——以中国社会学为例》,《人民论坛》2012年第8期;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贺雪峰:《回归中国经验研究——论中国本土化社会科学的构建》,《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1期。
- ⑪ 郑杭生:《社会和谐——战略机遇期中国社会的主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杨发祥:《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基于理论自觉的视角》,《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陆学艺:《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学有个大发展》,《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李培林:《社会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人民日报》2004年11月30日;吴忠民:《论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宋林飞:《从“风险社会”走向和谐社会》,《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洪大用:《机遇与风险:当前中国的社会政策议程》,《学术界》2004年第2期;吴忠民:《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风险与社会安全运行》,《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杨敏等:《“以人为本”安全观的一种社会学探索——个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 ⑫ 李培林:《中国贫富差距的心态影响和治理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郑杭生:《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吴忠民:《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李迎生:《制度建设与社会公正》,《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5期;景天魁:《底线公平与社会保障的柔性调节》,《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

- ⑬ 吴忠民：《改善社会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前线》2007年第9期；陈光金：《社会建设重点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理论参考》2011年第3期；李培林：《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求是》2007年第17期；李友梅：《改善民生与“以人为本”的境界变化》，《社会》2008年第3期；王春光：《制度—行动：社会治理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建设》，《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6期；王永平：《陆学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特点分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童星：《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唯实》2013年第12期。
- ⑭ 李培林、陈光金：《中国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郑杭生：《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人民日报》2011年4月21日；关信平：《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建设路径》，《人民论坛》2011年第11期；蔡禾：《广东在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建设体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12日；钟涨宝、狄金华：《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 ⑮ 蔡禾：《从单位到社区：城市社会管理重心的转变》，《社会》2018年第6期；郑杭生：《中国特色社区建设与社会建设——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杨发祥：《城市社会发展与郑杭生社区建设思想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徐永祥：《政社分工与合作：社区建设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东南学术》2006年第6期；杨敏、杨玉宏：《“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与社区治理新探索》，《思想战线》2013年第3期；姜振华：《社区参与：对社区居民与居委会互动关系的透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高鉴国：《社区公共服务的性质与供给》，《东南学术》2006年第6期。
- ⑯ 参见李培林：《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求是》2018年第3期；李迎生、吕朝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社会政策创新发展》，《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洪大用：《与时俱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3日；李强：《创新社会治理要激发社会活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日；陈光金：《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中国国情国力》2015年第11期；王春光：《制度—行动：社会治理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建设》，《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6期；张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求是》2018年第6期；李友梅：《我国特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杨敏：《“国家—社会”互构关系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兼论治理技术手段的历史变迁及当代趋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谢立中：《“发展”的含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及其原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4期；田毅鹏：《“模式研究”转换与发展社会学的学科更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4期；文军：《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发展社会学的中国观照及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4期；杨敏、杨筱明：《知遇历史：陆海双轴的国家政略新均衡态势——“一带一路”蕴含的深度互构与新发展主义》，《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A Review of So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YANG Min

(School of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PRC)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industrialization has moved towards the modern era, which is a long process of deconstructing the old society and constructing the new one. It is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that gave new birth to sociology,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is the theoretical response of sociology to the great change of modern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have pushed forward the research of soci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mulated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sociology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Starting from the new layou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Chinese sociology has formed many original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construction research. Nowadays, social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 mature academic field.

[Key words] Chinese sociology; social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social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岳天明/校对 正圭)